

資本主義殖民地體制的形成與亞洲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英國銀行資本對華滲入的過程

濱下武志

一 前 言

在以亞洲諸民族自生性歷史機遇和所謂「西洋的衝擊」為不可缺少的要素，經歷着排斥和接納而形成的主體的亞洲的「近代」中給中國近代史定位時，特別是在探討與上述國際性機遇有關的中國近代經濟史的時候，作為適合這一課題的對象，全面包括和集中表現國際經濟關係的金融問題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而且，可以說在這個包含通貨、市場、財政等一切經濟方面的金融問題之中，最能反映西方和中國之間的關係的，正是以採用金本位制的英國為中心的西歐和銀使用團中國之間的金銀的關係。

中國近代經濟史始於十九世紀初，中國被引入英美之間的棉花貿易關係的一環之後，三十年代後期達到了頂點，中國經濟社會開始被納入作為世界經濟循環結構一環的英國—印度—中國間的三角貿易結構之中，包括銀從中國流出的時期（參照二），在這種事態下，依靠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一年的第

一次鴉片戰爭，圖謀打開中國市場的大門。關於這一時期，以往的研究都是假設鴉片流入的增加↓白銀流出↓銀貴錢賤↓國內經濟的匱乏即矛盾的激化，這樣一種因果關係，可以說祇是着眼於國內問題。（一）

參照前面所作的分析，我們不妨把接下來的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因果關係歸納為如下的過程，即茶和生絲的出口擴大↓白銀流入↓銀賤錢貴。而且，第二時期與初期不同，通過白銀流入這一逆現象，中國市場的開拓以及外國資本對其的掌握這一貫穿中國近現代經濟史的事態，相反却愈加變本加厲了。關於這一點，看下一一八五六至一八六〇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及其結局（北京條約），就可以明瞭。這樣的話，就必須弄清楚白銀的流出與流入，這種表面看起來完全相反的現象，是如何從根本上導致了貫穿中國近代經濟史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和五十年代這兩個時期的，資本主義列強與中國經濟社會之間的統治—被統治、掠奪—被掠奪的關係。也就是說，有必要搞清楚，以白銀的流出和流入這一現象為媒介，而在實際上是其決定因素的，將中國經濟社會也包括在其中的，統一的國際金融關係即國際匯兌信用關係的歷史性本質。

本文的基本觀點是，圍繞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中國的世界市場的擴大過程，對中國近代經濟史來說是一個轉折期。即要從以前的三角貿易關係至此已經發生了結構性變化這樣一觀點，來分析美國、澳大利亞的黃金發現導致的國際金融市場的擴大過程，並且闡明這樣一個具有轉換即變動意義的過程，正是作為資本主義列強向亞洲特別是向中國金融滲透的逐步深化而出現的。（二）

謳歌「世界工廠」的英國產業資本，到了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其市場的開拓，已經不能僅僅依賴於個別的商人金融了，而必須借助銀行資本的力量。工業製品的市場開拓，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以倫敦金融市場為中樞向世界擴張的銀行資本的金融網。特別是在亞洲，加之各國國內市場的封閉性諸因素，可以說列強的滲透完全依賴於銀行資本的先導。總之可以說，亞洲的金融問題構成了通過國際國內的金融關係，來揭示亞洲的「近代」的歷史性內容與特徵的亞洲近代經濟史研究的固有領域。

二 前史——兩個三角貿易和圍繞中國的國際金融網的形成

直至十八世紀後半葉，英國的對亞洲貿易主要依靠用白銀同印度、中國的其它商品（胡椒、棉製品、藍、絹、茶、陶磁器）進行交換，特別是中國茶葉的出口在十七世紀以後有了長足的增長。其後，自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英國發生了產業革命，以英國棉工業為中心，需要開拓原棉市場和棉製品市場，引起了世界市場整體的變化。在亞洲，對以往壟斷印度貿易的東印度公司，本國產業資本家的批判日益強烈，其印度貿易的壟斷於一八一四年被廢止。此外，針對日益擴大的中國茶葉的進口，十八世紀七十年代以後，搬出其等價物印度鴉片，英國不再從本國向中國搬運白銀，而是構築起向印度出口棉製品、向中國出口印度的鴉片，從中國進口茶葉的對亞洲三角貿易結構（現稱之為A三角貿易）。這是將英國在亞洲必須獲得的三要素——棉製品市場、茶葉、統治印度的財源，與犧牲強制種植

鴉片的印度農民和強制消費鴉片的中國人民結合在一起的結構。因此，在這裏作為鴉片和白銀的交換而產生的印度——中國貿易，對英國本土發揮着如下的機能：東印度公司預先將資金貸給印度或廣東的地方貿易商人，在他們將所得之白銀匯往倫敦之際，以償還貸款的形式讓其購買公司商業票據，納入公司向本國的匯款（Home Charge）及分紅匯款這種掠奪殖民地的匯款渠道，通過倫敦金融市場的吸收，將中國貿易的結算（公司對中國貿易的壟斷於一八三四年停止）組成殖民地匯款制度的一環。（註）

表一 美國的對華貿易

(單位：1000 美元)

年度	輸出銀	匯往英國的商業票據	輸入商品(茶)
1819	7414	200	2603
20	6297		1888
21	2995		2398
22	5125		3068
23	6293		2047
24	4096		2364
25	6525		2438
26	5725		2056
27	1841	400	2032
28	2640	300	2455
29	741	657	2668
30	1124	424	2794
31	184	1169	2871
32	2481	667	2384
33	683	4773	2908

K.S.Latourette, "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784-1844", *Transactions of the Connecticut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Vol. 22, August, 1917, pp. 27-28.

不過，這一以東印度公司為媒介的中國——印度——英國的三角貿易及其結算結構，從中國結成的國際貿易，結算關係的整體來看，祇不過僅僅反映出事態的一半，而另一半是中國茶葉的對美出口。

自從一七八四年第一艘美國船「中國皇后號」抵達廣東以後，茶葉的出口一直大幅度增加，作為等價白銀流入中國。而且，從十八世紀

末到十九世紀初，由於產業革命的發展，這一時期英國和原棉供給市場美國的關係更加緊密，伴隨於此，倫敦金融市場也於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完成了向國際市場發展必須實現的向公開市場的轉化。其結果，倫敦金融市場得以向世界貿易提供大量的資金和信貸，促進了貿易的擴大，中國茶葉的對美出口也構成了其中的一環。也就是說，在華的美國商社在美國持有的對英棉花出口的債權的基礎上，發行匯往倫敦的商業票據，以此確立進行美國貿易的結算方法，這正是適用於茶葉貿易的方法（參照表一）。這一美國—中國—印度三國間的貿易關係及結算關係，就是中國結成的貿易關係的另一半（現稱之為B三角貿易）。

正如前面所明確的那樣，這A、B三角貿易關係，儘管面對的貿易對象國不同，但却相互依存，兩者均在倫敦金融市場結算，而且其背後都存在着英國棉工業的世界市場，即國際性金融網和殖民地掠奪的結構性連結。中國作為其中的一環，被轉嫁了對印度殖民地的掠奪。而且，完成中國貿易的內在

關連的十九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從其國際性機遇來看，相當於中國近代經濟史的開端時期。

接着到了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世界史上國際性諸機遇，如（一）淘金熱所促進的西歐工業生產及世界貿易和一八五七年世界經濟危機，（二）一八五三至一八五六年的克里米亞戰爭所表現出來的勢力關係（英法聯合對抗俄國）向東亞的擴張（第二次鴉片戰爭、璦琿條約、日本開國），（三）一八五七至一八五九年印度士兵農民的叛亂和東印度公司的廢止等等，與另一方面中國自身條件，如（一）茶葉、生絲的出口熱，（二）外國人總稅務司制度創立以後，根據天津條約、北京條約列強向中國國內

的滲透，（三）小刀會、太平天國運動造成清朝統治體制的動搖及對列強的依賴等等，兩方面相互作用，就迎來了後述的中國近代經濟史的轉折期。（五）

三 三角貿易結構（A三角貿易）的動搖

A三角貿易結構的特徵在於，英國即使不能從同中國的雙邊直接貿易中獲取利益，也可以通過把它作為包括印度在內的一個經濟循環結構發揮其機能而使其成立。然而，到了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這一結構由於（一）中國的茶葉、生絲出口激增和英國的棉製品進口停滯，（二）印度的鴉片的利潤率低下，（三）印度的出口增大和英國的棉製品進口停滯，開始顯著地動搖。構成三角貿易關係的各個兩國間關係，開始出現打破過去的均衡，或者發生逆轉的傾向。而且這些變化的結局，就是下一節將論及的英國、歐洲向亞洲的白銀流出和圍繞中國的貿易關係的國際性重新組合。本節將探討前述的A三角貿易結構的變動要因，以及位於其核心的東印度公司的歷史性作用的終結。

首先，中國的兩大出口商品茶葉和生絲，對英美的出口於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劇增，五十年代的年平均出口量為四十年代末的二至三倍（參照表二、表三）。另外，對澳大利亞、俄國的茶葉出口也增加了。（六）生絲也出現了同茶葉一樣的傾向。茶葉的世界消費量的絕大部分是由中國供給的，生絲的出口也由一八四二年當時英國的生絲進口總量的約百分之四·五，增加到了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百分之六十一（參照補表一）。對法國的出口，也於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中國生絲的需求產生後急劇增加，在十

表三 美國的對華貿易 (單位: 1000 美元)

年度	出 口			進 口	
	美國製品	英國其他製品	銀、貨幣	茶	生 絲
1848	2064	126	72	8083	
49	1461	222	10	5514	
50	1486	119	25	6593	
51	2156	329	147	7065	各年平均 358
52	2480	183	20	10594	
53	3213	524	489	10574	
54	1294	104	48	10506	
55	1533	185	675	11049	各年平均 620
56	2048	510	633	10454	
57	2020	2375	1898	8360	
58	3008	2690	2016	10571	
59	4233	2894	2050	10791	
60	*7171	1735	3156	13567	

*由於南北戰爭國內市場狹小化,出口一時性增大了。
根據柳汝楫《美國侵華史》,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一卷,93—94頁,及 Shü-Lum pan, *The Trade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China*, New York, 1924, P. 125 製作。

表四 英中貿易及對華白銀的流入 (單位: 1000 英鎊)

年度	英國的對華貿易		向亞洲·中國的白銀流入		
	出 口	進 口	英國→亞洲	法國→亞洲	英國→中國
1849	1537		3812		
50	1574	5249	5052		61
51	2161	7971	1715		130
52	2504	7713	2447		65
53	1750	8256	3118	848	579
54	1001	10588	3095	1451	2440
55	1278	10664	6432	1524	1391
56	2216	10652	12114		3219
57	2450	11448	16732		
58	2876	7043	4754		

The Economist, Dec. 29, 1855, Jan. 24, 1857, Sept. 17, 1859; W. Spalding, *Eastern Exchange, Currency, and Finance*, London, 1913 (2nd. imp.); T. Eannister, *A History of the External Trade of China, 1834-81*, China, *The Maritime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 1922-31. Shanghai, 1933, p. 41, 47.

表二 上海向英國的出口 (單位: 量、價額均為1000 Pounds)

年度	茶		生 絲	
	重 量	總 額	担(1000担)	總 額
1847	15863	450	18	1027
48	15729	515	16	763
49	20398	629	18	1023
50	27000	1006	14	1312
51	54234	2174	18	1601
52	46732	2175	26	1928
53	49774	2485	41	2750
54	36124	1794	48	2714
55	76712	3414	55	3569
56	42871	1647	92	7714
57	45758	3352	76	7320
			73	
58	45466	2774	(1000英磅)	5541
59	71917	5529	3310	3179
60	85295	6602	2203	2296
61	92145	6500	2767	2361
62	109756	8760	3270	3034
63	129440	10052	1696	1627

根據BPP, *Commercial Report on Foochow, Ningpo, Shanghai, 1858, 1861* P 19, 及 *Returns relating to the Trade of India and China, from 1859 to 1870, 1871*, p. 4 製作。

九世紀八十年代超越了意大利成爲最大的出口國。(7)另一方面,英國的對華出口停滯,亦使得中國出口的擴大愈加明顯。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爲了擴大英國棉製品的出口,人們紛紛議論有必要減少鴉片的出口,或者擴大茶葉、生絲的進口。(8)可是,到了五十年代,儘管實現了後者,棉製品沒有增加,白銀的出口却增大了(參照表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一八五七年經濟危機以後,比起經美國

轉口的對華出口和對華直接出口都增加了這一事實，更值得注意的是B三角貿易已經成了世界市場的特有一環。

其次是鴉片，據推算當時在中國吸毒已上癮者，一百人中就有一人，全國大約有二百萬至三百萬人。(一)一天的勞動所得為一百錢，而一天的鴉片煙錢據統計却大約達到了八十錢至一百二十錢不等。(二)將人毒害成廢物的鴉片，對於英國來說，却作為進口茶葉的等價物；而且成為支撐三角貿易整體的不可或缺的商品。印度政府即東印度公司實行強制生產和專賣制度，將其作為重要財源，根據一八八一年的統計，竟高達全部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以上。(三)但是，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後期到五十年代前期，鴉片的售價下跌，即使五十年代後期價格上升，利潤率却很低下(參照表五)。而且上海的鴉片進口也與上海的出口增長率不相吻合，還趕不上一般進口商品的增長率(參照表六)。

第三，看一下印度的進出口。印度自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中葉起一直是貿易順差，之後進出口都不斷增加，到了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後期出口出現劇增(參照表七)。因此，財富也是人大於出，特別是十九世紀後期急劇增長。反映這一動向，加爾各答匯往倫敦的外匯行情一直維持着很高的匯率。(一)印度的出口增加，雖然是因克里米亞戰爭而擴大的(參照表四)，所以，棉花、大米、靛藍、亞麻仁、砂糖等九世紀五十年代世界性工業及貿易的擴大所造成的(參照表四)，從貿易對象國來說，英國佔貿易量的一半以上，其餘則工業原料、食品的進口佔據出口的前五位。(二)從貿易對象國來說，英國佔貿易量的一半以上，其餘則與美國、法國、中國、澳大利亞等國結成了多邊關係。在五十年代，這些國家所佔的比重逐漸增大。

表五 印度的鴉片生產和對華出口

年 度	生產量(箱)	產地每箱價格 (盧比)	每箱平均實價 (盧比)	稅收總額 (千盧比)	對華出口 (箱)
1846—47	31295	272	877	26745	20668
47—48	36462	254	966	35246	19434
48—49	35385	258	1001	35432	27870
49—50	34419	257	937	32251	30996
50—51	33563	264	1109	37245	28892
51—52	39465	250	971	38348	27921
52—53	48322	253	760	36728	31433
53—54	53321	253	736	39279	33941
54—55	44442	248	944	39170	43952
55—56	43907	234	1090	47886	37851
56—57	32693	238	1444	47224	36459
57—58	27176	262	1639	44546	31878
58—59	21363	251	1760	37615	33858
59—60	21427	272	1846	39567	22329
60—61	29395	317	1449	42606	15688
*61—62	39656	379	1372	53872	21332

*根據《北京條約》鴉片解禁。

根據BPP, *Returns of Opium Exported to China from Central India via Bombay Since the Year 1830, 1865*, PP.6-12製作。

表六 上海的進出口

(單位：1000白銀兩)

年 度	進 口			再出口 (除鴉片外)	出 口
	一 般	鴉 片	合 計		
1855 (6月30日 迄的1年間)	3507	9113	12620	—	24549
1856 (6月30日 迄)	6492	11529	18021	—	23427
1856 (12月31 日迄的半 年間)	5190	5571	10761	—	20530
1857	15863	14253	30116	—	33344
1858	19017	15822	34839	—	30624
1859	20635	15397	36032	2900	36671
1860	26226	14857	41083	11752	31364
1861	33703	*12138	45841	21631	28239
1862	46702	18604	65306	30366	47570
1863	61704	20251	81955	35584	38485

*鴉片的關稅業務始於1861年。

BPP, *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 1862-64, 1865*, P.61.

從駐印度的賽克思上校 (Colonel Sykes) 的報告中，我們可以瞭解一八五八年當時的印度貿易具有如下特徵：(一) 過去的二十年間，對英貿易收支順差，並且逐年增加。(二) 同印度進行貿易的商

(單位：1000英鎊)

年 度	商品進口	商品出口	高價品進口	高價品出口
1834—39	4970	11072	2345	251
39—44	7691	13790	2762	463
44—49	9132	15675	3073	1321
49—54	10756	14900	4474	646
54—59	15366	22188	11223	801

The Economist, March 31, 1860.

人和製造業者，爲了結算貿易差額，不得不將大量的超過(自己出口的)工業製成品，並不斷增加的金塊(除用於投資以外)中的一部分，強制性地送往印度。(三) 東印度公司將每年的財政赤字，稱爲印度的貢品 (the tribute of India) (納貢的結果所發生的) 而使其正當化，爲抵貢品的匯款 (公司通過貸款等手段) 而助長了 (印度的) 商業活動 (擠出資金)。(四) 對 (公司爲擔保印度的出口商品而進行的先行貸款這種) 商品的擔保契約，在持續期間促進了商業活動。(五) 工業製品、高價品、匯往印度的公司匯票，以及在印度的商品擔保契約，所有這些對印度的出口手段加在一起，也不能完全結清英國對印度的貿易負債。所以，產生了必須使用其它手段 (白銀、向中國的鴉片) 進行調整的餘額 (The Economist, May 10, 1856)。根據這一報告，關於印度的對外貿易有如下兩點可以確認：第一，印度的貿易及其結算，與稱之爲「印度的貢品」的殖民地掠奪 (每年高達三百萬至三百五十萬英鎊的本國匯款義務) 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東印度公司壟斷着印英之間的匯款渠道。(二) 第二，由於貿易量超過這一匯款渠

道的容量而導致金塊流入印度，由此顯出了公司的金融能力的極限。那麼正是由於東印度公司所採取的、通過在倫敦發行、賣出盧比票據來回收依靠擔保契約放貸所得到的債權，這樣一種資金籌措方法中，其貸款對象也包括着擔任印中貿易的商社，因而事態不僅限於印度，還關係着 A 三角貿易結構整體 (參照四)。在這種狀況下，到十九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東印度公司遭到了來自英國本國產業資本及在印度的貿易商人的責難。也就是每年高達九百萬英鎊的公司紅利被匯往本國，使得相應部分來自英國的商品出口受到抑制。此外，對公司壟斷着外匯交易也有責難。(三) 這樣，一直佔據着 A 三角貿易結構的金融要地的東印度公司，其金融職能極限的暴露，以及對其金融壟斷的批判增強，這無異於是本國產業資本及銀行資本宣告了東印度公司的歷史性作用的終結。

四 國際金融市場的擴大與亞洲貿易結構的國際性重新組合

(一) 美國、澳大利亞的淘金熱和向亞洲的白銀流入

構成以往的亞洲貿易關係，制約着英國和亞洲的貿易，金融關係的 A 三角貿易結構的動搖，究竟產生了怎樣的新的國際貿易關係的歷史性結果呢？這基本上可以說是以淘金熱爲契機而帶來的，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國際金價市場擴大的結果，對黃金的認識，在以前，是有重金主義傾向的。「正如 The

Economist, Sept. 20, 1856 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在美國、澳大利亞發現黃金以前，商人自不待言，就連政治家也都認定，一國的財富祇能依貴金屬的擁有量來計數，商業的繁榮程度也只能靠金銀的流入來判斷。然而，到了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末，却向「現在，金塊的流出入並不具備高於其他商品進出口的重要性」(The Economist, Aug. 27, 1853)這樣一種純粹作為交換手段來認識其有角性的角度傾斜。關於淘金熱給國際貨幣、金融市場帶來的劃時代的影響，一八五六年九月六日《經濟學家》報曾刊登了題為「一切黃金的終結」的綜述。該報首先指出，一八四八年加利福尼亞和一八五一年澳大利亞的黃金發現，招致了金銀比價差縮小、物價上升等一般性結果。接着又描述了黃金產出額、金幣鑄造額、金銀流通額的增大情景(參照補表二)，並給予了如下說明：

……在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過去八年間)所生產的高達一億零五百萬英鎊的黃金當中，有五千二百萬英鎊被用於填補這一時期急劇增加的商业需要。因此(餘下的)五千三百萬英鎊不過是被用來取代過去在美國和法國所使用的等額的白銀。在此難免會產生這樣的疑問，即那麼巨額的白銀到哪裏去了？恰好是在這一時期，在印度和中國產生了前所未聞的(白銀)需求。(The Economist, Sept. 6, 1856)

這裏所闡述的是，產出的黃金在被英國、歐洲吸收、擴大了貨幣流量的同時，被黃金所替代的白銀被印度、中國吸收了(參照補表三)。關於具有這一國際性循環關係的金塊的移動，一八五六年十月十八日的《經濟學家》進一步報道說：

在現在同亞洲的貿易中，毫無疑問，我國存在巨額負債。而且我們必須準備以對我們最爲有利的的方法作爲「償還手段」。(在亞洲)白銀比黃金更有利可圖。因此，將償還我們的工業製品從美國和澳大利亞進口的黃金的剩餘匯往大陸，換成我們向中國匯款所必需的白銀，這是既方便又有利可圖的行爲。所以，黃金離開英國的理由之一無疑是爲了購入白銀。(The Economist, Oct. 18, 1856)

這清楚地表明，向亞洲的白銀流出，是作爲有利於貿易結算的匯款手段而採取的策略。黃金大發現以後活躍起來的國際性金塊移動，以英國爲吸收的中心，法國發揮着金銀兌換的媒介職能。這些白銀被出口到亞洲，形成了上述與亞洲的關連構造。向亞洲的金、銀塊出口，過去是根據印度的貨幣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也進行了。可這一時期白銀出口量大增的特點，主要針對中國，而且從法國也有白銀出口(參照表四)。將這一事態與A三角貿易聯繫起來闡述的話，可以說英國向中國的白銀出口已沒有過去那麼大量，而且，經由法國向中國的白銀出口也是這一時期的新事態(從中國向法國的生絲出口一直在倫敦金融市場結算)。這表明亞洲貿易的結算結構已發生了變化。

第一點變化是，茶葉的結算被集中在倫敦。關於英國承擔了美國和澳大利亞進口茶葉的負債這一點，《經濟學家》報如是說：

澳大利亞每年從中國大量購入茶葉，而與之能交換並在中國有市場的東西却一樣也沒有。美國也大量進口着遠遠高出對中國直接出口額的茶葉和少量的生絲。這兩個國家共同對華的十

分順暢的貿易的差額，必須由英國彌補。澳大利亞將本國的金塊送往英國，也就是說，澳大利亞從中國進口茶葉，用向倫敦開出外匯票據的方法支付。於是再用送往倫敦的黃金來抵銷。同樣，進口到合眾國的茶葉也用向倫敦開出外匯票據的方式支付。然後再用從美國（向我國）進口的棉花來抵銷。其結果，除了我國（自身）在進出口中所欠中國的差額以外，與從澳大利亞進口的黃金、美國進口的棉花相關連，必須向中國支付巨額的款項。（*The Economist*, Sept. 17, 1859）

關於中國茶葉的進口，通過以倫敦為中心的國際結算機構，負債都集中到了英國。美國、澳大利亞分別用棉花和黃金進行茶葉的結算。另一方面，英國掌握着中國貿易的結算機構，所以通過中國整個的對外出口貿易，確保了本國的棉工業原料，集中着使棉製品銷售變得容易的信用擴張所需要的黃金金塊。坦率地說，形成了這樣一種關係，即中國茶葉的出口越擴大，不僅是中國市場，英國棉製品在整個世界開拓的市場就越大。不過，金產量的擴大及隨之而來的貨幣供給的增加，刺激了以英國、法國、美國為中心的工業、商業，直接、間接地擴大了世界貿易及國際金融市場。下面，把英國的年出口額每隔十年與主要對方國作一個比較，可以看出如下三點特徵（參照表八）：（一）對產金國美國、澳大利亞的出口進入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飛躍增加。（二）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出口，對外國和對殖民地國家都在增加，增長率殖民地較高。（三）對美國的出口增長率，這一階段還不太高。可以說，正是這樣，英國集中了無論是雙邊的還是多邊的，同世界各國的貿易關係的結算，由此構築起作為世界工場和世界銀

表八 英國的出口貿易

（單位：1000英鎊）

貿易對象國	1831	1842	1853
〔外國〕			
漢諾威	3643	6203	472
漢薩諸都市			7093
荷蘭			4423
比利時	2083	1099	1372
法國			2636
中國	519	969	1374
美國·加利福尼亞	9854	3585	23658
……	……	……	……
外國總計	26939	34120	65552
〔殖民地〕			
英屬非洲	257	369	1213
英屬印度	3358	5170	8186
英屬澳大利亞	403	999	14514
……	……	……	……
殖民地總計	10255	13261	33382

The Economist, Sept, 9, 1854.

行的穩固的構造。

以上所看到的圍繞亞洲貿易結算結構的深化，使印—中貿易結算發生了從東印度公司向殖民地銀行轉移的變化。這一點將在下一項詳談。下面我們首先要明確其前提——印中貿易和從英國向中國的白銀流入之間的關係。前面的《經濟學家》報這樣說：

英國自身對華欠債的借貸清算負債，和澳大利亞及合眾國欠的負債一起，大部分都用中國在鴉片和棉花交易上所產生的負債額來抵

償，（從中國向印度）匯出相應差額部分的款項。而且，我們自身的對印度進出口現在大體平衡，因此（從英國）向印度的大量的白銀出口之所以發生，其大部分是爲了支付這一（對中國）差額。

資本主義殖民地體制的形成與亞洲

(The Economist, Sept. 17, 1859)

正如前面所述，集中於英國的茶葉進口國對華的負債，是用從印度向中國出口的鴉片和棉花支付的（參照補表五），這之上的負債部分，用白銀經由英國向中國支付。將這一點與A三角貿易聯繫起來看的話，可以說以前的商品循環關係依然維持着。所以，它提示出下面的歷史性問題，即A三角貿易中的鴉片，與世界市場擴大（等於B三角貿易的深化）下的英國的棉製品，對中國市場是否形成了競爭關係。但是，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以後的英國產業資本，進一步說大英帝國的對華貿易，在根本上來說是「棉布加鴉片」。而且，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末期，一方面是實現了對華鴉片貿易的合法化和內地關稅的廢除；另一方面是朝着東印度公司的撤銷，即市場擴大與殖民地統治相結合的方向收斂。在這種狀態下，代替東印度公司成爲開拓中國市場的金融尖兵而登場的，是負有新的歷史使命的殖民地銀行。

(二) 殖民地銀行向亞洲的發展(三)

如「三」中所見，東印度公司在印度及中國的貿易壟斷權被廢止以後，仍然依靠爲確保佔整個財政支出的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三十的本國匯款的匯款體制而必須維持的擔保預貸制度，支配着英國——印度之間的貿易結算。不僅如此，還反對威脅自己的匯款制度的殖民地銀行向亞洲的發展。其理由是，根據喬治三世（一七六〇至一八二〇年在位）時期的法律第四十七號，在印度經營銀行業時，

設立銀行的批准權被授予了東印度公司。⁽¹⁾但是，衝破東印度公司、印度省立銀行、大代理商會（獨自經營外匯業務）的阻止網絡，在亞洲的第一家殖民地銀行東方銀行集團（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屬如銀行），於一八五一年被授予「皇家許可證（Royal charter）」，被准許在斯里蘭卡開設銀行，在喜望峯以東斯里蘭卡至中國的地域（除印度）進行存款、匯款和外匯業務。在黃金發現以後的貿易、金融擴大之前，正如東方銀行一例所表現出來的那樣，英國本國的產業資本及銀行資本，已經在試圖突破以本國匯款制度爲中心構築起來的東印度公司亞洲貿易結算機構的框架。⁽²⁾

在此後不到一年的時間裏，以亞洲、澳大利亞爲營業範圍的殖民地銀行開設計劃紛紛出台，緊隨東方銀行之後，印度、澳大利亞、中國渣打銀行（Charter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and China）（麥加利銀行）作爲在亞洲的第二家殖民地銀行而設立。一八五二年十月九日的《經濟學家》報所公佈的銀行開設計劃是這樣的：

印度、澳大利亞、中國渣打銀行，主要是針對澳大利亞殖民地和英屬印度、中國、東方諸羣島及其它地域之間廣泛而日益膨脹的貿易，擴張合法的銀行活動的諸項便利。因爲在這一領域，這種機構還未完全建立起來。但與此同時，本行的目的還包括對英屬印度、中國、澳大利亞各自與這個國家（英國）之間的直接貿易，謀求提供迄今爲止還沒有充分提供的銀行的便利。……最近的黃金發現，與自古以來的而且現在正在急速擴大的澳大利亞、印度、中國相互間的貿易領域不同，將會引導出巨大規模的全新搬運方式。東洋從來而且一貫的，現在也是美國產出的硬通貨

資本主義殖民地體制的形成與亞洲

(白銀)的最大市場。同這個國家(英國)一樣，從南美的西海岸也有大量的硬通貨直接地被裝上船舶。……澳大利亞所產出的大部分黃金，被直接地運到了最好而且最近的市場——印度及其。它現在談及的國家，其結果隨着出口進口貿易一起在膨脹性地增加，這一點是確實的。(The Economist, Oct. 9, 1852)

在這裏，將問題的焦點集中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圍繞亞洲的貿易活動的擴大和黃金發現以後的金融活動的擴大，明確地道出了銀行擴張的意圖。銀行謀求的是，承擔亞洲、澳大利亞地區內部的貿易金融，進而承擔起英國和上述地區之間的直接貿易的金融。這是適應圍繞亞洲的貿易關係的變化的動向，也就是要打破由於亞洲地區內部貿易擴大所產生的金融職能的局限性——A三角貿易結構的動搖和其結果產生的東印度公司金融職能的局限性，瞄準創立與本國的直接貿易——B三角貿易的擴大、深化和將A三角貿易包括在其之下——直接聯結的金融關係，而且並不把據點置於倫敦金融市場的動向。這些銀行，不僅介入東印度公司及大商社掌握的亞洲貿易金融，而且以直接貿易金融這一新領域，而這正是英國產業資本所期待的必不可少的領域的開拓為課題。

果然到了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末，有評論說在英中間直接貿易中，工業製品的銷售開始出現成效。一八五九年九月十七日的《經濟學家》報這樣寫道：

認為我們同中國之間的直接貿易是重要的，其理由不僅僅是因為它達到了相當的量，還由於最近它顯示出了令人吃驚的增長勢頭。祇要我國的製造業者冷靜地判斷一下，就會抱有這樣的

希望，即對於幾乎肯定是無限的市場，我們已經找到了有效的(出口)手段。(The Economist, Sept. 17, 1859)

關於直接貿易的內容，比起茶葉和生絲，英國的工業製品的出口被視為更重要的事情。在英國的入超這一以往一貫的傾向中，到了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末，工業製品從茶葉的單純對價物的位置，向從中國發現了銷售市場這一位置轉變。同本國的結算渠道依靠殖民地銀行確保的基礎上的工業製品的出口，這充分意味着貿易結構上的變化，而絕不僅僅是量的擴大。而這一點也正是代替有着地區封鎖性的三角貿易，即茶葉的結算構造的新的直接貿易關係的內涵。

開設計劃接着預測，從美國流向中國的白銀，從澳大利亞流向印度的黃金將增加，主張對隨之擴大的貿易銀行能發揮作用。從中國向美國的出口用來自美國的白銀結算，或者從印度向澳大利亞的出口用來自澳大利亞的黃金結算，這一事態本身祇不過意味着形成了區域性終結的貿易關係和其結構。因此，英國銀行資本向這之中的發展，形成了區域內自我不能完結的國際金融結構，具體來說，就是倫敦金融市場吸收了金銀，由此擴大了英國的信用，就可以適應前述產業資本、金融資本的要求，這一點具有歷史意義。歷史的演變表明，銀行起到了這一作用。銀行依靠給予的長期信用才可能使在中國間的貿易商社向本國匯款，進而使英國工業製品的銷售成爲可能。而且這一事態促進了工業製品的出口這一點已是不用贅述的了。(三)如上所述，將中國重新編織的世界市場及國際金融網絡，是怎樣規定了中國的貿易、金融的呢？圍繞中國探討這些問題將是下一節的課題。

五 對中國的投資與中國的金融從屬地位

(一) 上海金融投機和白銀流入的新特性

在「四」中我們看到，以黃金發現為契機所產生的金銀的國際性循環的一環中，存在着白銀向亞洲的流入。而且我們找到了這一白銀流入的一般性動因，與以世界工場英國為中心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擴大的工業生產和國際貿易，更直接的原因是由於中國的出超。但是，在規定這一流入的歷史性特徵時，作為前提必須確認中國對外貿易的他律性。即中國的出口擴大，並不是源於中國方面生產及流通條件的自我變革，在市場擴大、價格決定、貿易的主力、貿易結算等各個領域，都被外國市場所規定，被其引導而產生。這是因為擴大的白銀流入的性質已從如此這般的貿易的特徵中可窺見一斑。(二) 在上述條件的前提下，我們再來搞清楚白銀流入的實質與其歷史特徵。

就一八五六年上海的貿易結算狀況，駐上海英國領事館的羅伯特遜Robertson曾這樣說道：

白銀(交易)在該港(上海)的貨幣交易中，始終是一個固定項目，但是還另有佔據重要位置的稅收的來源，那就是外匯交易。一八五六年用外匯進行的交易總額每月平均有六十萬英鎊，年間達到七百二十萬英鎊。這主要是對鴉片匯款和生絲運輸所開出的票據結算及其它進行的。這一項目由於從該港整體的貿易中抽出來表示金額，所以不能適當編入貿易報告，不過有留意的價值。(BPP, 廣東、福州、上海商業報告, 1856—57, 1857, P. 54)

表九 廣東上海的外匯行情

	廣 東		上 海 匯往倫敦(每1美元)
	匯往倫敦 (每1美元)	匯往印度 (每100美元)	
1852前	4s. 4d. ~ 4s. 8 $\frac{1}{2}$ d.	220~228盧比	
後	4s. 9d. ~ 4s. 11 $\frac{3}{4}$ d.	228~235	
1853前	4s. 9 $\frac{1}{4}$ d. ~ 5s. 3 $\frac{1}{2}$ d.	226~246	5s. 4d.
後	5s. 1d. ~ 6s. 6d.	237~300	7s. 1d.
1854前	4s. 10d. ~ 5s. 3d.	231~249	6s. 4d.
後	4s. 7d. ~ 4s. 11 $\frac{1}{2}$ d.	234~243	6s. 4d.
1855前	4s. 7d. ~ 4s. 11d.	223~232	6s. 5d.
後	4s. 8d. ~ 4s. 11 $\frac{1}{2}$ d.	218~225	6s. 8d.
1856前	4s. 9 $\frac{1}{2}$ d. ~ 4s. 11d.	225~235	6s. 8d.
後	4s. 8d. ~ 4s. 11 $\frac{1}{2}$ d.	222~236	7s. 4d.
1857前	4s. 8 $\frac{1}{2}$ d. ~ 5s. 1d.	218~234	6s. 6 $\frac{1}{2}$ d. ~ 7s. 5d. (每兩)
後	4s. 9 $\frac{1}{2}$ d. ~ 5s.	220~237	6s. 5d. ~ 7s. 3d. (每兩)
1858前	4s. 6d. ~ 4s. 10d.	215~223	6s. 1d. ~ 6s. 3d. (每兩)
後	4s. 3 $\frac{1}{2}$ d. ~ 4s. 9d.	215~222	5s. 10 $\frac{1}{2}$ d. ~ 6s. 9 $\frac{1}{2}$ d. (每兩)

North-China Herald; S. Williams, *The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Hongkong, 1863, P. 361. 此外, s是先令, d是便士的意思。

這裏指出了進出口都依靠外匯交易作為結算手段。當時上海的外匯市場與廣東市場比較穩定的狀態不同，一直呈上升趨勢（參照表九）。於是，「經濟學家」報寫道：

根據最近的報告，運往印度的（白銀的）大部分據說又返送回中國。在中國因為外匯行市高，所以（白銀）比起在本來的去所（印度）可以獲取的利潤要高，成為更有利的投資手段。這樣一來，恐怕可以說亞洲的白銀需求完全取決於中國的外國貿易狀況（*The Economist*, Jan. 14, 1854）發生了以外匯投機為目的的白銀流入。

如上所述，事實上由於貿易出超導致的白銀流入這一事態的實質就是，以巨大的進出口差額為直接的原因，外匯行高暴漲，其結果引起了以外匯投機為目的的硬通貨的流入。這可以說正是中國已被編入了國際金融網即外匯結算網，所以才出現的現象。而且，後面將談到，東方、渣打等殖民地銀行把持了與本國的外匯交易的一大半，操縱外匯使它們獲利匪淺。

使白銀流向亞洲的第二個動因，在於利用金銀比價差的黃金投機。向中國流入黃金這一現象早在美國黃金發現之後就曾在廣東出現過，也曾一度使廣東的金價下跌，不過不久又接近了國際黃金行情。〔三〕此外，在一八五六年駐廣東英國領事的報告中也寫道：這一年流入廣東的白銀有八百至九百萬美元，向上海、福州也送去了相同金額的白銀，中國政府也為了戰爭開支購入了白銀，向印度運送了三百萬美元以上的金棒（gold bar）、金葉（gold leaf）。〔四〕由此我們知道了中國、印度不是僅僅使用白銀的國家，即使在中國貿易港也有黃金行市，而且，從西歐流入亞洲，並且看似退出流通被貯藏

起來的白銀的移動，不僅被充作貿易結算，而且還被充作吸收來自亞洲的黃金的等價物，即使這後一點也說明在亞洲黃金的流通，構成了硬通貨（黃金白銀）國際循環關係的一環。這一循環關係，以西歐與亞洲的金銀比價之間存在差異為基礎，隨着日本的開港，以黃金投機為目標的白銀流入，導致了可以稱之為黃金熱的狀態的出現。出任英國駐日本總領事兼外交代表的阿爾柯克（R. Alcock）在其著作《大君之都》（*The Capital of the Tycoon*）中描述黃金投機利潤之大時曾這樣寫道：

「商人們」爲了進行購買（日本）帝國金幣的交易，渴望搞到手一分白銀（由幕府配給的用於在開放港口同外國白銀的交換）。然後再把它們（金幣）運到中國，在那裏按最保守的估計他們也可以得到百分之一百的利潤。〔五〕即使是在金幣價格上漲的時候，他們也能在兩個月內使資本翻一番。……至少有百分之百的賺頭，而且又穩定又確實的白銀和黃金的交換就在眼前。試問還會是誰去光顧存在行情下跌風險的茶葉和生絲呢？（R. Alcock, *The Capital of the Tycoon*, London, 1863, Vol. I, P. 282 - 283）

而且，成爲向日本的淘金熱的基地，並且向其提供必要白銀的源頭正是上海，正是以墨西哥鷹元爲中心流入上海的外國白銀。〔六〕但是，這種直接的黃金投機具有一時性的特點，早晚應顯示出平衡化傾向。對亞洲的黃金投機，作爲現象表現出右邊的態勢，而這以後的展開顯示出，圍繞着金銀比價的差價西歐和亞洲的關係，向更爲構造型統治——從屬的關係轉化。關於這一點，《華北哈洛德》（*North-China Herald*）中有如下記述：

資本主義殖民地體制的形成與亞洲

在中國，現在有相當多的人其生活物資是通過（滿足）外國貿易的需求來取得的。而且，早在生產資料價格到達外國人能用白銀支付的極高的價格之前，貿易中介人已能夠發現是靠比白銀便宜的西洋黃金，還是靠西洋的工業製品，作出某種妥協（來進行交易）是很有效的方法。採用後者的誘惑，隨着（爲了獲得）資金的費用的增加在不斷增大。這樣做的話，等於是肯定地（給黃金）增加了巨額的附加價值。而且，中國人至今仍頑固地固執於（在中國黃金貴）的金銀比價，這等於是對生絲和茶葉的生產者課以重稅。其結果造成了外國製造業者處於比中國人有利的競爭狀態。外國商品，即使現在採用白銀作爲（結算）基準的話，則可以低於歐美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的價格出售，同時還可以留下外匯交易的利潤。（*North-China Herald*, March 7, 1857）

也就是說，由於在中國黃金價高，所以商品交易以白銀計價，外國一方用黃金或者工業製品支付比較有利。這是因爲，在西歐以黃金計價購入的工業製品，到中國用白銀計價進行交易的過程之中，利用西歐的金錢銀貴、中國的金貴銀賤這一比價差價，可以帶來雙重的外匯差額利潤，在此之上還能使低價格化得以實現，從而可以在另一方面以低價買進茶葉和生絲。而且，在中國得到便宜的白銀，如果以黃金計價向本國匯出外匯的話，還有比價差部分的利潤可圖。但是在這裏可能會出現如下疑問，即在採用白銀價格的中國如何能使用黃金呢？而且，基本上不使用黃金的中國金融市場上爲什麼金銀比價會金貴呢？在此我們必須探討這樣一個問題，即正如英國（西歐）與中國各自有自己獨立的金銀比價那樣，金銀比價的差異的實質是什麼。就像我們剛才所見到的那樣，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流向

廣東的黃金，曾一度使金價行情下跌，而不久又顯示出平穩。這意味着兩點，第一是開放港口的黃金行情被外國黃金所左右。第二是黃金流入降低黃金行情這種一般性傾向是妥當的。因此，爲了維持與此完全相反的狀態，就必須操縱黃金行市，發揮金銀交換的職能，將英鎊（金本位制的英國）——美元（以白銀爲結算手段的中國關係的金銀比價，能夠維持在英鎊堅挺的狀態中。而且，掌握着這一金融職能的要諦的是外國銀行及大資本的洋行（外國商社）。以西歐優越的近代資本的力量爲後盾，形成了以倫敦金融市場爲首的世界金融市場，祇要形成了這樣的世界金融市場，外國銀行及大洋行就可以操縱金銀的差價。看一下當時上海的金銀狀況：

到了一八五四年，中國的生絲產量一年間漲了一倍。隨之外匯也逐漸攀升。這以後的二三年間，匯往倫敦的六個月期貨外匯，有時曾達到一美元七先令二便士至七先令六便士，匯往印度的盧比匯率曾達到一百美元爲三百二十至三百肆拾盧比。而且銀行票據和商業票據的賣價差價經常是百分之一點五至百分之二。（*Six Essays on the Trade of Shanghai*, pp. 64-65——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金融史料組編《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第一輯，上冊，中華書局，一九六四年，五十九頁再次引用）

這樣以中國出口貿易順暢爲背景，外匯行市上升，而且流通着銀行票據、商業票據。由於這一外匯行情對英國工業製品的進口處於有利的狀態，加之銀行票據、商業票據所具有的換金職能發揮作用，上海的貿易金融才得以運營。這樣一來，依靠銀行票據、商業票據的使用使黃金價格的採用成爲可

能，金銀比價也才能被掌握着外匯行市的外國銀行一手操縱。正是這樣，形成了在國際貿易中處於優勢的黃金使用國的基準制約着白銀使用國的關係，即根據金本位國的金銀比價決定中國的金銀比價的關係。而且，並不是直接適用英國的比價，而是通過掌握貿易金融的銀行，大洋行將金銀比價維持在金貴銀賤這種貿易的結算關係，來逐漸迫使中國在金融上處於從屬地位。

接着以上圍繞金銀比價中國的金融性從屬化的問題，下面圍繞銀「銀」比價和白銀投機與國內金融市場的關聯，探討一下決定白銀流入的性質的第二要因。

直至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後期，在上海一直持續着過熱的銀貴狀態。這與從整體上來說因白銀缺少而出現的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銀貴不同，是白銀流入狀態下的銀貴。祇不過其實質是這樣的一種銀貴，即以行市活躍為背景，祇有西班牙元（特別是卡洛斯四世元）被選擇性地以較高的附加價值在流通。因此，首先西班牙元在歐洲被獵購，緊接着銀條流入，再後來墨西哥元也大量流進來。但後兩者由於在市場上遭到貶值，因此不能馬上投入流通，錢莊先低價購進這些白銀，製造出白銀短缺的現象，以圖抬高國內市場價格，促進銀貴即白銀投機。^(二二)更有甚者，東方銀行製定了這麼一個營業規定，在該銀行開戶的活期存款，必須使用西班牙元。可以看出外國銀行也促進了銀貴即白銀投機。^(二三)正是應該稱作銀「銀」比價差的這一西班牙元和墨西哥元、馬蹄銀和市場價格之間的差價也導致了白銀流入的現象。當時這一選擇着銀貴的主導者雖然是外國銀行和錢莊，但在此必須注意的是中國國內的金融狀況。在當時的上海，各貿易商品的交易（特別是生絲和鴉片）是與特定的銀幣（西班牙元）連

鎖在一起的。^(二四)因此，銀幣價格的漲落，可以說是貿易狀況的更直接的貨幣表現。而且這一動向正如有報導說，生產者農民（乃至與此有關的商人）在支付時要求用西班牙元，可以推測與農村中的生產、流通狀況也有很深的淵源。^(二五)

問題還不止於此。因為銀價的高低，直接關係着構成國內金融的基本局面的銀錢比價，以及直接生產者農民的販賣、購買和納稅等等。到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後期，發生了急劇的錢貴狀況（根據一八五七年的記錄，數年間上海兩一兩從一八〇〇錢變為一一六〇錢了^(二六)）。在這種狀態下，等於是農民受到了銀貴導致的稅賦負擔實質性增加和錢貴引起的物價高漲的兩面夾擊。^(二七)於是，靠着通過壟斷貿易金融而擴張的外國金融勢力，以白銀流入即白銀投機為媒介擴大對上海金融市場的影響力，實質上甚至也能左右農村的金融，儘管是通過錢莊為媒介的，這樣上海的金融狀況與農村緊密相連的事態，也構成了可以展望以後的歷史性方向的事態。^(二八)

如上所述，投入外匯投機、黃金投機、白銀投機的白銀，以金銀比價、銀「銀」比價、銀錢比價等諸條件為媒介，承擔起為使倫敦金融市場，分階段地構選性地掌握直至中國農村的亞洲金融市場的新的歷史性作用。接下來的課題是，對可以稱之為向中國的白銀流入的歷史歸結點的問題，就資本投入、清朝財政借款作如下的概觀，以求得把握中國「近代」的特質的線索。

(二) 借款和金融性從屬

對中國的資本投入，當時並沒有如在印度所見到的那樣，作為向開墾投資、種植園投資等直接的農業投資而表現出來，^{〔三〕}而是貿易投資一直佔很大的比重。不過，以一八五七年的世界經濟大危機為轉折，出現了具有新特徵的投資活動。以一八五七年經濟危機為契機被促進了的中國市場開拓（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的締結），為了確保在那裏的棉製品銷售、茶葉的收購，作為投資市場的中國的開放已成為必不可少的條件。於是，這以後投資對象一向港灣、航運、鐵路等貿易關聯事業，一向官僚、清政府的軍事、政治借款不斷擴大。第一類對象當中，鐵路投資被認為：

我們（駐華外國商社）認為，〔鐵路建設的結果所帶來的〕民衆的繁榮，在歐洲和印度所適用的法則，在中國也同樣適用。鐵路的建設與維持必定會對人民的幸福作出貢獻，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M. Stephenson, *Railways in China*, London, 1864, P. 47）

經過持續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對美國、對印度的鐵路投資熱，中國也被定位於這一延長線上。而且在中國的鐵道建設具有如下幾點好處：一是推進剩餘人口的移動，並可以迅速地轉移軍隊，由此有助於鎮壓叛亂。二是可以防止地方官吏從中榨取流通稅，促進進出口，使政府稅收增加等等。一八六三年七月，包括英國的伯特、賈汀瑪賽遜，美國的哈德、拉塞爾等商社在內的二十七家駐上海的商社，向江蘇巡撫李鴻章請願批准建設上海——蘇州間鐵路的計劃。他們開辦了上海與蘇州鐵路公司，研製了僅土

地收購費一項就超過一萬英鎊的投資計劃，以圖在開始全國性鋪設計劃時，使生絲的收購地，同時又是華中內地市場要地的蘇州，與外國貿易直接聯結在一起。然而，這一計劃遭到中方的反對，受到一時的挫折，其真正實現一直等了十幾年。但是，外國商社向在中國鐵路建設計劃集中的過程，表示出在這一時期要求投資活動新開拓的現實。^{〔四〕}

第二類的，以官僚為對手的軍事借款、政治借款，被用於鎮壓小刀會、太平天國等叛亂。上海道台吳健彰（一八五三——五四年）、兩廣總督黃宗漢（一八五八年）、江蘇巡撫李鴻章（一八六三——六五年之間共三次）等就是初期借款的借方。這些都是外國商人放貸的，以外國人稅務司（頭銜是被清朝僱傭的稅吏）徵收、管理的海關稅為擔保，從海關稅中償還的。其初期貸方大洋行，却由於十九世紀初棉花熱衰退的結果，趕上了謳歌了半個世紀的商人的黃金時代的終結，以往大洋行和銀行的勢力關係發生逆轉，確立了銀行在貿易金融及投資活動中的優勢地位。^{〔五〕}其後，在借款方面銀行也成為主要的貸方，三位一體地兼任資本籌措、借款貸放、擔保（海關稅）管理，中方對此的金融性依附，一直擴及到清朝的財政。另一方面這種變化與清朝政府一側的財政基礎轉移（釐金稅、關稅比重的擴大）齊頭併進。^{〔六〕}

作為轉換期的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其中國棉花出口熱雖然一直持續到六十年代初期，但一八六六年危機却引起了嚴重的貿易停滯，在這過程中，在外國銀行主導下被淘汰整理的外國金融勢力，利用七十年代以後的銀價下跌又增加借款供給，另外，介入八十年代上海的經濟危機又擴大了影響力。正

是這樣，他們將國際的、國內的變動即轉換的主要原因掌握在自己手中，靠着這一點充當列強向中國擴張的先鋒。^{〔三七〕}

六 結束語

中國近代經濟史，將其從整個經濟活動的集中表現的金融一側來觀察時，第一，是中國經濟被編織在以倫敦為中心的整個世界一元化國際結算構造中，第二，中國同西歐結成的金融關係是作為，（一）貿易結算（外匯交易）——金銀比價變動，（二）開港城市的貿易、金融——銀「銀」比價變動，（三）農村金融——銀錢比價變動，這種通過三個階段的作為金融性從屬而構成的。第三，自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起在亞洲真正展開活動的英國殖民地銀行，處於第一點中國對外金融關係的外延擴展，和第二點國內金融市場開放的核心地位，通過向清朝的政治借款，起到了先於帝國主義階段，作為列強侵入亞洲的先鋒作用。

在以上幾點的基礎上，歸納一下本文的觀點的話，亞洲的「近代」被包進世界史的近代的過程，如以前所述，在經濟方面，其特徵是金融性統治——從屬的過程。而且，這一金融性統治，在一方面，正是由於不僅是貿易金融，而且通過亞洲固有的金融機構的媒介，把直接生產者即農民也包括進去，而另一方面，還正是由於它一直左右到了關稅徵收、借款供給等國家財政，所以，在十九世紀末葉帝國主義時代到來時，金融資本對推進帝國主義政策發揮了主要的作用。因此，它成為以亞洲諸國農村到政

治中樞為對象劃分統治勢力範圍的權利分割這一帝國主義政策的引導力量，並且承擔着支撐這一政策的核心理作用。也就是說，金融的統治，與政治、軍事的統治不可分割地結合在一起了。與此同時，在展望以上金融統治的歷史性方向時，必須確認在中國起作用的金融統治的具體表現的特殊性。其突出的一點，我們可以在集中表現為政治借款的金融統治的特徵中看到。政治借款的作用，表面看起來，其對象停止在中國行政權力的政策措施階段，並沒有表現為列強對中國國家權力的直接掌握（即殖民地化）。但是，由於政策措施的框架受到制約（即中國主權的從屬化），主權受到了侵蝕被架空。換句話說，圍繞某種政策借款成立的時候，中國的主權祇作為接受借款的必要形式而存在和起作用，以這種借款供給即金融統治為媒介，中國的主權已到了喪失其根本實體的地步。半殖民地體制的特徵極端地表現在政治借款上的原因，也正在於此。

另一方面，這一帝國主義統治及對其從屬的主權的狀況，決定了反對它的鬥爭必然是反國家政權的，同時又必須承擔起反帝國主義的鬥爭的課題。關於這一政治即經濟鬥爭的實踐過程的分析，將在其它論文中進行。

註：

〔一〕參照彭澤益《鴉片戰後十年間銀錢錢幣波動下的中國經濟與階級關係》（《歷史研究》一九六一年第六期）。

〔二〕在本文中略去了中國國內金融問題，關於這一點，請參閱百瀨弘的《清代的西班牙元的流通》（上、中、下）（《社會經濟史學》六一）

二、三、四、一九三六年(增井經夫的《清代白銀商人的動向》、《歷史評論》一六七、一九六四年七月)、宮下忠雄的《中國幣制の特
殊研究——近代中國銀兩制度的研究》、日本學術振興會、一九五二年等等。

(17) 一七九五年不再存從國外帶入中國的白銀(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
na 1635-1834*, Oxford, 1926, Vol. 2, pp. 265-266)。

(18) 關於東印度公司的匯款制度與中國的關係,必須與駐廣東的洋行(外國商社)進行的金融活動一起研究,詳細情況將另文專述。
參照 M. Greenberg,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42*, Cambridge, 1951。

(19) 本節請參照田中正俊的《中國社會的解體和鴉片戰爭》、《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序說》、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七三、西村孝夫的
《英國東印度公司史論——英國東印度貿易及貿易思想史研究的序論》(大阪府立大學經濟學部、一九六〇年)、K. N. Chaudh-
uri, *India's Foreign Trade and the Cessation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Trading Activities, 1823-
4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Vol. 19, 1966。另外,關於圍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中國的多邊的結算結構和
白銀流出問題,請參閱拙稿《近代中國的貿易金融的考察之一——十九世紀前葉的銀價暴漲和外國貿易結構的變化》(《東洋學
報》五十七—三、四、一九七六年三月)。

(20) 向澳大利亞的出口,以福州為例,從一八五五年的九十萬英磅增加到第二年的四百萬英磅(BPP, *Commercial Report on
Canton, Foochow, Shanghai, 1856-57, 1857*, p. 37)。另外,向俄羅斯的茶葉貿易的增大,特別是一八五四年以後,對茶葉

支付解除了白銀的禁令,大量的白銀流入中國,這與中國國內白銀流通的關係引人注目。請參照吉田金一的《關於俄羅斯同清
朝的貿易》(《東洋學報》四十五—四、一九六三年三月)。

(21) 關於中國的生絲出口在法國繅織物工業中所佔的位置,請參照服部春彦的《十九世紀法國繅工業的發展和世界市場》(《史林》五
十四—三、一九七一年五月)。

(22) D. E. Owen, *British Opium Policy in China and India*, New Haven, 1934, pp. 209-212。

補表一 英國的生絲進口
(10萬英鎊以上的國家,單位:1000英鎊)

年度	1842	1852	1853	1854	1855	1856
荷蘭	364	271	182	156	96	92
法國	1156	172	275	148	139	158
馬耳他	11	70	99	139	67	62
土耳其	731	570	621	214	154	197
埃及		911	1863	1540	773	2514
印度	1360	1335	539	697	884	610
中國	180	2418	2838	4577	44437	3724
其他國家的 包括總計	3952	5833	6431	7535	6619	7384

North-China Herald, Aug. 22, 1857.

(23) Bpp, *papers relating to the Opium Trade in China, 1842-
1856, 1857*, pp. 53-57.

(24) G. W. Cooke, *China*, London, 1858, p. 179.

(25) 吉岡昭彦的《英國棉業資本和本位制爭論》(岡田與好編《近代革命的
研究》下卷,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七三年)一九九頁。

(26) Thomas Tooke, *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during the Nine Years 1848-56*, London,
1857, Vol. VI, Appendix XXI.

(27) *The Economist*, Aug. 1, 1857.

(28) 格拉斯哥的對印度貿易商人帕頓(W. Paton)在下院特別委員會的證
詞(Bpp, *Commercial Distress, 1847-1848, 1849*, pp. 107-
125)。另外,請參照德永正二郎的《外匯和信用——國際結算制度的
歷史展開》(新評論社,一九七六年)二八三—二九一頁。

(29) 一八四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曼徹斯特商工會議所對東印度公司發表
了抗議書。公司批判的內容主要是以下兩點:(一)由於進行擔保預
算(hypothecation),所以發生了價格的恣意上漲,引起了外匯行情

的混亂。(二)由於公司的長期信用票據(十個月滿期)提供了過剩的信用,因此謹慎而堅實的資本(公司以外的資本)難以進入
商業交易(Bpp, *ibid.*, p. 124)。此外,公司的擔保預算(即向本國的外匯匯款額)在貿易壟斷停止後擴大了,在對華貿易中大
量放貸,一八三四至三五年的一年間達五十一萬英鎊(在對印貿易中是二十一萬),以後,九十六萬(一百一十萬)、九十七萬(一

資本主義殖民地體制的形成與亞洲

補表四 法國的金銀進出口額

(單位: 100萬美元)

年 度	金		銀	
	入 超	出 超	入 超	出 超
1849	1.2	—	48.8	—
50	3.4	—	14.6	—
51	17.0	—	15.6	—
52	3.4	—		0.6
53	57.8	—		23.4
54	83.2	—		32.8
55	43.6	—		39.4
56	75.0	—		56.8
57	89.2	—		72.0
58	97.6	—		3.0
59	107.8	—		34.2
60	62.2	—		31.4

J. Laughlin, *The History of Bimetal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886, P.119.

補表五 印度—中國間貿易額

(單位: 1000英鎊)

	印度的對中國出口			中國的對印度出口		
	商 品	錢 物	計	商 品	錢 物	計
1853—54			[6704]			[810]
54—55			[6445]			[915]
55—56			[6592]			[787]
56—57			[7568]			[599]
57—58		134	9501	916	2502	3418
58—59	11811	2	11813	1249	4969	6218
59—60	9983	145	10128	987	2158	3145
60—61	11358	132	11490	1119	1471	2590
61—62	10452	15	10467	996	3400	4396
62—63	12112	15	12128	1397	3170	4568

註: []內的數字只是商品出口。

[] *The Economist*, Sept.17,1859, 其他見BPP, *Returns relating to the Trade of India and China from 1859 to 1870*, 1871, P.6,

資本主義殖民地體制的形成與亞洲

六四七

補表二 黃金產量與造幣額
(黃金產出額)

(單位: 1000英鎊)

	加里福尼亞	澳大利亞		計
		維克多利亞	新南威爾士	
1848	11.7			11.7
49	1600			1600
50	5900			5000
51	8000	439	468	8907
52	11200	6136	3600	20936
53	12000	8665	1781	22446
54	13600	8256	773	22629
55	12900	11304	209	24413

(造幣額)

	美 國		倫敦造幣局	巴黎造幣局
	金貨	銀貨	金幣	金幣
1848	858	464		
49	2047	481		
50	7269	424		4600
51	14230	176	4400	9600
52	12920	223	8742	1000
53	8950	2063	11952	13100
54	5890	1959	4152	20480
55	6679	796	9808	16140

注1, 以1英鎊=4.4美元換算 2, 以1英鎊=25法郎換算
The Economist, Sept.6,1856;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1789-1945*, Washington, 1949, P.278.

補表三 黃金流通額及白銀的調換額

8年間產出金合計10,500萬英鎊

英國的國內流通2000萬英鎊 其中,用銀調換金額4,300萬英鎊
法國的國內流通5000萬英鎊

美國的國內流通(含銀行準備金)其中,用銀調換金額
2500萬英鎊 1000萬英鎊

9500萬英鎊 5300萬英鎊

英國的金幣出口(澳大利亞、埃及、錫蘭)英、法金幣在克1000萬英鎊
里米亞戰爭區域內的流通。

10500萬英鎊

根據 *The Economist*, Sept.6,1856 製作。

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 宋元明清卷
百萬)三十萬(一百萬)三十九萬(六十二萬)(Bpp, ibid, p.129, 133)。
當時金價下跌, 同白銀的比價至一八六七年達一比十五·五以下, 接近一比十五。另一方面, 在採用複本位制的法國却維持

六四六

比十五·五，因此黃金持有者在法國可以換到更多的白銀(J. Laughlin, *The History of Bimetal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886, p. 119)。另請參照補表四。

〔廿〕所謂殖民地銀行是指設立於英國殖民地(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亞、印度為四大區域)的英國資本的銀行。其特徵在於可以進行本國的總公司同殖民地的直接的金融(A. S. J. Baster, *The Imperial Banks*, London, 1929, p. 20-48)。

〔廿一〕C. Mackenzie, *Realms of Silver*——*One Hundred Years of Banking in the East*, London, 1954, P. 16.

〔廿二〕另一方面，在印度五十年代初期，在加爾格答商人的壓力下，東印度公司也停止了在印度的英鎊商業票據的買入，祇在倫敦販賣開往印度郵務局的票據(K. N. Chaudhuri, 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India under the East India Company*, 1814-58, A Selection of Contemporary Writers, Cambridge, 1974, P. 39)。

〔廿三〕一八五八年，在世界危機波及中國的時候，伯里商會(Birley & Co.) 特地購入一二銀行的票據，本國匯款成爲可能 (Sheila Martiner, *Rathbones of Liverpool, 1845-73*, P. 194)。此外，美國工業製品的對華出口，最終與中國的生產及市場條件處於相互制約的關係，不過本文略去了現在中國一方的條件。

〔廿四〕例如茶葉出口，被英美間購買競爭和倫敦行市等所左右，並且在英國製造的中國——印度——日本之間的競爭關係下，被強制於低價競爭。關於亞洲貿易圈的問題，還包括英國的出口貿易問題，準備另文論述。

〔廿五〕B.P.P.,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49*, 1850, p. 9.

〔廿六〕B.P.P., *Commercial report on Canton, Foochow, Shanghai, 1856-57*, 1857, p. 28.

〔廿七〕「是國際比價一比十五的程度，可在日本祇有一比三。即用四個一分銀(重量為1/3美元)，在中國及其他地方，可以買一個價值18S. 4/4d. 的金幣(有三分以上的利潤)。(R. Alcock, *op. cit.*, p. 281)。

〔廿八〕一八五九年的二年間，在上海市場遭到貶值百分之二十一至二十八的墨西哥元，被送到長崎的達二百五十萬元(North-China Herald, Jan. 7, 1860)。

〔廿九〕North-China Herald, Nov. 29, 1856.

〔三十〕North-China Herald, Jan. 18, 1851.

〔三十一〕North-China Herald, Sept. 13, 1856.

〔三十二〕在North-China Herald, sept. 13, 1856 中，有如下記載：「生產者producer's的大部分，除了與上海元(西班牙元)交換以外，拒絕賣出其產品……對我們(外國商人)來說，生絲和茶葉是這樣，對地方商人(native dealer)來說，棉花和土布是這樣。」

〔三十〕 Mr. Moncrieff (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 Shanghai) to the Earl of Elgin, October 2, 1857, B.P.P., *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s to China and Japan, 1857-1859*, 1859, p. 66.

〔三十四〕North-China Herald, Nov. 29, 1856 中論述銀價，錢貴的影響時這樣寫道：「貧窮者過去靠着得到許多的金錢，因而部分地挽回，因美元價格暴漲而蒙受的損失，可現在元和錢都減少了(升值)，因而從兩方面遭受損失。而且，無論何處，生活費都大爲增加。」此外，圍繞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後期上海金融市場的過熱狀態結算貨幣的變化(從西班牙元到上海兩)，與內地金融的關係，擬另文分析。

〔三十五〕關於外國銀行同錢莊的連結關係，參申報等曾這樣描述道：「銀行設立當初，僅同外國商人交易，海外匯款以英鎊(金幣)計價爲主，手頭的白銀幾乎沒有借貸。(但是)已巳(一八六九年)餘姚的王某(王槐山)擔任了匯豐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一八六四年設立)的董事(實辦)。他過去是錢莊經營者，熟悉錢莊的具體業務，使得銀行(向錢莊)進借借貸(《申報》一八八四年一月十二日)。」

〔三十六〕B.P.P., *Minutes of Evidence Taken before Select Committee on Colonization and Settlement (India)*, 1858, P. 56, 166.

〔三十七〕關於對印度鐵路投資，有如下研究。參 L. H. Jenks, *The Migration of British Capital to 1875*, London, 1938, 關於在中國鐵路的建設，有 P. H. Kent, *Railway Enterprise in China: An Account of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London, 1938, 資本主義殖民地體制的形成與亞洲

don, 1927.

〔五〕駐上海英國領事在一八六五年的報告中寫道：「最近，商社的大部分業務都依賴着的銀行貸款資金被撤回，其整個的結果是不斷發生大量的破產。……就連世界馳名的商社也不得不蒙受損失來處理掉在上一輩的商人黃金時代所積累起來的財產（*Op. Commercial Report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 Japan and Siam, 1865, Shanghai, 1866, P. P. 36-37.*）」

〔六〕此外，一八八五年的清朝稅收如下表，所謂的流通稅比重最大。（參照羅玉東《中國鑄金史》，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何烈《鑄金制度新探》，商務印書館，一九七二年。E. G. Beal, Jr., *The Origin of Lihin, Cambridge, Mass, 1938*等書）。

〔七〕關於這一問題，請一併參閱拙稿《十九世紀後期，在華外國銀行對金融市場統治的歷史特性——從與上海的金融危機的關聯的角度》（《社會經濟史學》四十一—三，一九七四年十月）。

地稅	2,830萬兩
金稅	1,260萬兩
關稅	1,140萬兩
鹽稅	240萬兩
關稅	740萬兩
鹽稅	1,480萬兩
捐納他	7,710萬兩

王建華 譯

濱下 武志（一九四三——） 靜岡縣人。一九七八年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科學研究所科博士課程修了，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留學香港大學。歷任一橋大學經濟學部助教授，現任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專攻近代中國經濟史，主要著作有《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等。

關於清代土地法秩序「慣例」的結構

寺田浩明

清代土地法（廣義指民事法）秩序不是依據國家成文法，而是依據民間「慣例」維持下來的。有關「慣例」的內容，僅在日本就有《臺灣私法》等很多詳細的研究。筆者也曾對從明末到民初廣泛存在的多重所有權慣例——田面田底慣例的內部結構以及其產生、存在、變動過程進行過分析。^{〔一〕}但是現在看來，包括筆者的研究在內，關於所謂「慣例」的規範形式本身與定義的問題的分析，並不是從正面進行的。從法律史學觀點來看，這至今還是一個有待研究的領域。最初某種特定的土地法在某個地區是以怎樣的具體形式存在的，同時，這個「慣例」原來正確的定義是指社會行動的何種方式而言的等等，關於這些問題，我們還只停留在粗淺的分析和記述上。

當然，過去的研究也並不是沒有任何前提條件。一般說來，其採取的漠然不清、常識性的對應方式是，「慣例」至少沒有採取成文法規的形式，如以西洋法規範的形式來說，是相當於「習慣法」的。但是最近滋賀秀三先生的多方論證，使我們清楚地認識到這種方式是不能成立的。^{〔二〕}

滋賀秀三先生的研究重點是清代民事審判的性質，尤其是在糾紛中地方官是依據甚麼準則進行裁判的，民事審判的法源到底是甚麼。他以此為目的，首先對當時由地方官裁判的民事判決案例進行

關於清代土地法秩序「慣例」的結構